

论五四文学中性别与阶级的遇合与交互

程 亚 丽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五四时期,性别话语与阶级话语几乎同时登场,但在20年代阶级矛盾尚未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表达阶级对立的阶级话语与表现女性解放的性别话语在文学实践中并行不悖。随着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迅速传播,阶级概念不可阻遏地进入了作家的意识,成为作家不自觉分析社会阶层的范畴与工具,性别问题尤其是底层女性的生活处境因其本身在当时社会的令人触及与阶级意识的相通,成了“为人生”作家首选的叙事内容或社会表现方式之一。处于开端期的新文学同时将两种话语组织进文学创作,它们交互作用,共同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实践中得到了丰富的文学呈现,在冰心、庐隐、叶圣陶、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创作中,两种话语有机交互并叠合,共同构筑了五四“人的文学”的政治光谱,诠释着五四妇女解放的具体内涵。性别和阶级两种主流话语在新文学中遇合与交互,对无产阶级性别化的理想和诗意想象,预示了五四文学向革命文学转化的趋势,既是对现代道德伦理与个体原则的弘扬与捍卫,也有机传达了知识分子的先进政治理念,是文学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的显著表征。

关键词:五四文学;性别;阶级;交互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4-0129-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412

女性不是无差别的一个整体,并不仅仅处身于女性所属阶层的个人境遇中,在女性身份之外也被派分了种族、阶级、地方等其他身份。把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分析范畴,探讨它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是新世纪以来性别研究致力的主要方向,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和阶级关系这一学术领域除了有贺桂梅、董丽敏等人对1940年代延安文学的少量研究成果外,其他文学阶段的成果仍然阙如。本文将从阶级与性别的视角出发,考察五四文学的生成与延异,发现自1919年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大量引入中国,在上世纪20年代阶级矛盾尚未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表达阶级差异对立的阶级话语与表现女性解放的性别话语在文学实践中并不冲突,它们并行不悖,处于开端期的新文学同时将两种话语组织进文学创作,两种话语有机交互并叠合,共同织就五四“人的文学”的政治光谱。

一、性别与阶级的相遇

在晚清,现代性别话语与阶级话语几乎同时出现,但真正将性别革命与阶级话语结合起来的却是由无政府主义者何震首先主张,她最早提出将妇女解放纳入阶级革命当中,“故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

收稿日期:2025-06-12

作者简介:程亚丽,女,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抗战文学、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与阶级关系研究”(20BZW143)。

相表里。若经济革命不克奏功,而徒欲昌言男女革命,可谓不揣其本矣”^[1]。但其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两种话语在趋于保守的民国之初舆论场中都受到抑制,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性别话语才重又随妇女贞操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的讨论而浮出水面。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与李大钊《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等文提出了打破旧道德束缚,建构新的性道德,实现男女平等的吁求。几乎与此同时,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迅速引介与传播,尤其在欧战胜利后“劳工神圣”的社会背景下,阶级话语愈发漫漫炽长,并与五四期间的性别话语双向互渗。在田汉、祁森焕、李大钊、陈望道及瑟庐等人对“第四阶级”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中,两种话语相互声援、辩证支持。田汉撰文指出第三、第四阶级的女子运动的不同,揭示性别中的阶级和阶级中的性别之分^[2];陈望道则一语道出第四阶级妇女运动“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3];沈雁冰则形象概括“第四阶级”劳工妇女的群体特征,“社会最无实力而人数却是最多的”,“这等妇女,天天在生活压迫之下……他们每天和生存奋斗,没有时间受教育,也没有金钱受教育”^[4]。

五四性别话语与阶级话语从并行不悖到渐呈合流趋势,它们交互作用,共同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实践中得到了丰富的文学呈现,诠释着“五四”妇女解放的具体内涵。1919年叶绍钧发表小说《这也是一个人?》^[5],如其题目所质询,让人“悲愤的”正是篇中女性“他”不被当“人”看的性别境遇。故事带给人极大的震撼,小说篇幅很短,头尾两句话,就定义了“他”——“物”的生存地位。在第一句的结尾——“简直是狠简单的一个动物”,“动物”二字就概括了这农妇悲惨的人生。既然她“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衣食”,所以15岁时就被家里的人“嫁掉”,夫家同样是把她作为会说话的牲口,“如今把他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得少养半条牛”。她只是夫家的生育工具,“嫁了不上一一年,就生了个孩子”,但贫困的家境决定了孩子“不到半岁,就死了”,这使她陷入绝境:为孩子哭泣却被婆婆打骂,加上丈夫好赌,输光了她陪嫁的冬衣,还以拳头粗暴地对待她,她便跑出家门去城里当女佣。可见她并不是怯懦得完全不知反抗的女人,她的“出走”说明她想反抗被夫权压迫的命运。幸而进到城里,主人对当佣工的她很好,“他从此得新生活了”,但不巧的是她公公找来了,要让她回家,很快公公让父亲也找来了,最终她在其夫死后被公婆随便卖了廿千钱,“不种了田,便卖耕牛。他是一条牛……把他的身价充他丈夫的殓费,便是他最后的义务。”这是一个“第四阶级”妇女的辛酸故事,尽管指称女性的代词“她”这时尚未出现,对她的指称还是沿用的男性代词“他”,“他是一条牛”这句话却也充分说明了“第四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知识分子不无悲悯的叙事视角,叙述暗含悲愤,显示了叙述人对劳动阶级妇女命运的不平和对她们悲惨境遇的底层关怀。显然小说并没介入阶级视角的观察,除了展现底层女性的生存与性别境遇,没有以任何阶级的意义填充小说,是一篇“问题小说”,也仅提出“第四阶级”妇女受父权制性别压迫的问题,却没有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法。正如“五四”一些知识者所揭示的,第四阶级妇女在底层生活中当牛做马,挣扎在贫困线上,她们少知无识,缺乏主体意识,只有永远地让人支配,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毫无疑问,发表在1919年《新潮》上的这篇小说是对叶绍钧同年第2期上《女子人格问题》^[6]这篇文章的生动注解。在这篇长文中,他认为“女子应具人格,因为他定是大群里头一分子的‘人’”。但文章指出绝大部分女子难有人格的现实,“既不健全,又不独立;岂特人格不完;竟可说‘没有人格’”。并指出完善人格的路径是发展能力:“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女性在那个时代的觉醒时代应当确立独立人格的重要意义和推翻旧道德建立新道德的必要性,格外发人深省。

以形象的文学方式诠释妇女的性别与阶级关系的,除了一些成名作家,也见于其他不知名的作者,如1921年《劳动与妇女》“创刊号”上发表的署名“楚伦”的小说《一顿饭》^[7],类似于现在的微型小说,虽篇幅很短,但构思精巧,故事情节简单却别具文学意味。小说通过一对劳苦阶级夫妻在不同的两个庖厨工作内容的对比,揭示“第四阶级”男女分别承担的阶级、性别境遇,让人充分意识到社会存在的阶级

差异与性别压迫,并强烈感受到性别的阶级化区分。阿福作为受压迫的劳动阶级对女主人的责骂不敢有丝毫抗辩,但回到家里却可以向为他备好饭的妻子以同样的主子的口吻发泄他在工作中所受的不平之气。同为女人,中产阶级妇女与下层阶级女性显然身处两个境遇不同的生活世界。“太太”坐享其成,吃着现成的美食,还嫌菜冷了品味差了;阿福的妻子“伊”则要给在外受雇佣的丈夫做好饭,饭冷了还要受丈夫斥骂。更有意味的是,劳动阶级妇女除了与丈夫共同承担阶级的命运,还要额外承受丈夫的性别压迫,在外受女主人责骂的阿福却可以在妻子这儿滥施夫权淫威。

法国女权主义者费罗拉·特里斯指出:“连一个最受压迫的男人也可以压迫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无产者的无产者。”^[8]这正是女性主义所指出的男性对女性的“天然”的支配权力或“内部殖民”:“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利对女人实施的支配”,通过这一体制,“实现了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女性主义认为,这一支配关系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都更坚固、更严酷,也比阶级的壁垒更普遍、更持久^{[9]33},它既存在于上层阶级的男性对同一阶层或不同阶层女性的支配中,也存在于底层阶级的男性对同一阶层的女性的欺凌中。小说除了人物阶级境遇的参差对比,还有阶级差异下生活条件的高下对照:中产阶级太太一顿饭享用的是“满案酒肴”,有“蒸的炒的煎的炖的”,吃的是“香梗米”做的饭,饭前还要沐浴,饭冷了就斥骂下人;作为下层妇女的“伊”,给丈夫阿福备好的饭不过是黄米饭,一条煎鱼,半瓶酒,自己吃的只是“冷饭团”而已。作者将性别与阶级两个维度同时织入小说,在叙事充满张力的同时,也将性别和阶级关系的问题抛给读者。

二、性别与阶级的叠合

五四文学最早以女性主体身份表达性别话语的冰心,她的问题小说创作中与阶级话语不期而遇,小说中性别和阶级两个元素有时共同存在。但客观说,女性的性别境遇得到了充分展现,阶级境遇却往往隐而不彰,证明早期新文学作家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流行方法的影响并不凸显。

1920年,冰心发表于《晨报》上的短篇小说《庄鸿的姊妹》^[10]反映的是平民女子平等受教育的问题,揭示出女性所受到的性别歧视与其所处阶级生活背景密切相关。庄鸿的姊妹,因为“中交票”跌落,叔叔做小学教师拿不到薪水,导致家中经济拮据,生活难以维系,无法支撑她和弟弟都读书上学。在祖母看来,女孩子没必要做那么大的学问,省出余款应首先保证“将来可以做官”的弟弟读书,于是让姊妹牺牲了自己的前途来栽培“我”。尽管姐姐富有才情和志向,仍被迫中断学业,以帮助家里维持生活,这也导致她心有不甘郁郁而终。小说从第一人称“我”——男性自省视点出发,看起来批判的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实际上揭示了平民女子的性别境遇,即女性在封建意识和经济困窘双重压迫下不能平等受教育的问题。冰心曾在一篇时评里向社会呼吁,要“促进女子教育的解放”,“应当提倡妇女职业——使妇女经济独立”^[11],可谓一语中的,是对这篇小说的最好注脚。另一篇《最后的安息》^[12]则从人道主义出发,直面底层女性的生存痛苦,通过一位渴望读书识字的乡村女孩的苦难,揭示了底层女性遭受的性别与阶级双重压迫:十二岁的城里少女惠姑来到乡下的自家别墅度假,认识了一个乡下女孩翠儿。两人的身份境遇全然不同,一个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有文化、活泼又善良的城市少女,一个是“第四阶级”可怜贫穷的农村少女——童养媳。两人出于同龄孩子的纯真,很快建立了友谊,惠姑还帮翠儿干活,告诉她城里新鲜的事情,教她识字。尽管翠儿仍然经常被她“妈”打骂,但因为天天与惠姑玩在一起,过得非常开心。但有一天,惠姑劝翠儿寻求自由的话被她婆婆听见了,以致翠儿被毒打致死,等惠姑赶到翠儿住的屋里,见了最后一面便离世了。冰心为这故事营造了一种悲剧氛围,她着重描写了女孩子的纯真友谊,表现翠儿的聪明和对自由的向往。一个生命意识强烈的少女,竟被封建婚姻童养媳制度吞噬了年轻的生命,着实让人痛心。冰心揭露了封建性别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封建家庭桎梏压榨下女性的生存不自由,但在着力书写纯真的童心时,却有意忽略二人贫富与阶级的差距:惠姑家里有房有产,有父母关

爱,出门有仆人陪同;翠儿却寄身于童养媳的身份,生活贫苦,每天都要干粗活,还要挨打受骂。“生在世上十四年了,从来没有人用着怜悯的心肠,温柔的话语,来对待她。”在见识上,没有文化的翠儿更是远远不能与惠姑相比。但冰心故意给这一底层少女的人间悲剧缀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写她临终时,“灿烂的朝阳,穿进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像接她去到极乐世界”。就这样,冰心抹平了阶级差异与翠儿承受的性别境遇,试图用宗教幻象来安慰生者与死者。看起来冰心着力表现的是在乡村性别制度下女性命运的悲惨,对处于底层阶级的穷苦女性一掬同情之泪,但其实却把人与人之间悬殊的阶级差异与封建家庭对童养媳的迫害问题处理得简单化了,以致消弭了故事应有的悲剧性。虽然日本学者牧野格子认为,冰心是直到1931年的小说《分》才显示出从“自己生长的幸福家庭和所属阶级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13]411},但正如王绯在《空白之迹》中所言,《最后的安息》已经“可见冰心性别与阶级双重意义的生命关爱”,及所透露出的“‘第三阶级’/进步知识女性的思想倾向”^{[14]499}。

由此可见,随着马克思主义在1920年代初的迅速传播,阶级概念不可阻遏地进入了作家的意识,成为作家不自觉分析社会阶层的范畴与工具,性别问题尤其是底层女性的生活处境因其本身在当时社会的令人触目及与阶级意识的相通,而成了“为人生”作家首选的叙事内容或社会表现方式之一,两种话语在文学中实现了话语叠合,共同支撑起五四文学的人学内涵。

当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在五四文坛上愈来愈盛行时,贺玉波在《现代女作家》中批评庐隐“闺秀”题材过于狭窄,认为她应该“把描写的对象转移到那些大多数被压迫束缚的劳动妇女身上去;并且对于现社会组织应先有一番研究和分析”^[15]。但其实庐隐对劳动阶级女性的生存命运还是相当关切的,如短篇小说《一封信》^[16]中所写贫民女儿梅生的遭遇就被庐隐有意填充进阶级的意义与内容。首先,小说赋予聪明的梅生劳苦阶级家庭的身份与处境。在小说中。她有“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珠”,“一个满身缁缕的女孩子,面上黑灰涂满了,但是她那明亮的眼珠;和雪白的牙齿;红润的嘴唇;苦闷,肮脏,却掩不住她的秀媚聪明!”但奈何她是佣妇的女儿,在梅生十五岁那年,因母亲给外祖母医病借了“为富不仁”“别有用心的陈大户的二十块钱,梅生就被地主强行抵债进了陈家,没有几天就被主母活活折磨而死。作家通过梅生的悲惨遭遇清晰表达了素朴的阶级意识,揭示了贫民女性遭受的阶级与性别双重压迫,对贫民女性不幸的命运表达了深切的人道关怀与同情,也控诉、鞭挞了居心不良的富绅强取豪夺、欺压良善的恶行。小说情节无疑有阶级意义的强烈填充,对为富不仁的地主阶级欺男霸女的恶行进行了有力抨击,“反映了庐隐对不平等的阶级制度与社会革命问题的关注”^{[14]505}。

庐隐对劳苦阶级尤其是女性的命运格外关切,其短篇小说《灵魂可以卖吗?》^[17]精心塑造出一个纺纱女工荷姑的形象,由此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下女性劳动异化的心灵痛苦。荷姑中学预科快要毕业之前,因为父亲生病,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将要到手的文凭,去工厂做工。做了四五年工的她深感自己被机器生产线劳动“异化”的痛苦,向“我”提出“灵魂可以卖吗”的强烈质疑。在工厂里,工人不能思想,要全神贯注于工作,一旦被发现走神,工头便“板着铁青的面孔”“恶狠狠”的教训:“工厂里用钱雇你们来,不是叫你运用思想,只是运用你的手足,和机器一样,谋得最大的利益,实在是你们的本分。”在资本家严酷的压榨、规训下,荷姑很快成了纺纱的熟练工,但她认识到,“这样过了三四年,我自己也觉得我实在是一副很好的机器,和那纺车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对象的异化不过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的结果”,“劳动的外化”即是表现在“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18]65}。很显然,荷姑需要智识阶级的“我”帮助的不是我臆断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匮乏,而是比生存的金钱更亟需的精神救赎。“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她向“我”倾吐自己做工以后的心声:“那急徐高低永远没变更过一次的轧轧隆隆地机器声,充满了我的两耳和心灵……我的工作实在使我厌烦”。小说也揭示了“我”因与荷姑阶级差异所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为自己对荷姑需求的误解感到了羞愧,但却无力解决荷姑提出的生存难题。在“劳工神圣”的热潮中,

作家关注到了作为产业工人的纱厂女工这个群体,切实触及到了“劳工问题”最复杂的本质:不是作为剩余价值被剥削带来的无产阶级的生存苦难,而是他们面对被大机器生产所异化的劳动问题。作家之所以把一个女工作为小说主人公,笔者认为那是因为要通过荷姑的眼泪召唤阶级“共情”,让人对工人劳动异化的痛苦更加感同身受。“我看着她那种凄苦憔悴的神气,怎能不陪着她落下许多同情泪呢?”可见,庐隐“在社会革命问题上受到相当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对不平等的阶级及社会性别制度持有先进的思想主张”^{[14]506},这是她显著区别于冰心之处。

一向专注于女性题材的作家庐隐,借助一个纱厂女工形象反映了工人劳动异化的重大问题,但为何又没有表现出女工在工人阶级中的性别特殊性?这显然是一个值得继续追寻的疑问。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女工的特殊性在于,相对于男工,女工是资本家雇佣工人的首选,因为“一则女工工资低贱,二则女工、养成工从小就受资本家养成恭顺的奴隶牛马,能容资本家的喜则调笑,怒则鞭挞,能容受资本家的剥削,无敢反抗”^{[19]2}。可见,在揭露工人遭受资本家剥削这一问题上,女性更有典型性,而应该正视的问题是,女工因为特殊的生理及生育状况,在工厂劳动中面临的问题其实远远超过男工,但小说并没有反映出女性性别的特殊性和工人阶级的群体意识。可喜的是,荷姑和她工厂里的“同伴”对“灵魂可以卖吗”的疑问代表着女工工人阶级意识的萌动与觉醒,有研究者指出:“女工,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中出现的新群体,从出现那天起,就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了资本家眼中的优质‘劳动工具’。虽然她们主动与被动的成为了工人中的弱势群体,但仍在近代产业工人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23} 庐隐在《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中对劳工阶级妇女做了详细调查,认为“现代的妇女问题,已经不是独立的东西,早就与社会问题打成一片了”。她进而论述:

现在社会上最使人看不过去的是什么?最不近人的生活的是贫民阶级的生活?以我观察以为现在社会上最看不过的事情,便是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以榨取劳工们的血汗,以快其利欲的私心。那最不近人的生活的是阶级,便是劳动阶级,他们得食之难,真堪使人酸鼻痛心,而其中尤以妇女为可怜,因为她们劳动的结果,用血汗不减于男子劳工,而所得的报酬,又往往低于男子劳工,此外她们还有比男工可怜的地方,一方面为谋食而进工厂,供资本家的榨取;一方面又要兼顾育儿。^{[21]7-8}

文章揭示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下丝厂女工群体受资本家剥削的性别特殊性,与小说《灵魂可以卖吗?》形成互文,从女工职业与性别双重身份的意义上探讨了工人阶级本质的问题。庐隐曾经另外撰文探讨妇女的出路,鼓励女性“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22],但在社会制度没有得到根本变革,女性职业没有社会保障时,这种“作人”的理想不过是一种女性臆想的乌托邦。

三、阶级与性别的交互

刘禾《跨语际实践》一书在谈到新文学大多数作家在处理压迫与剥削的问题时指出,他们共同的一个写作倾向即“发现下层阶级的女性形象要比下层阶级的男性形象更受欢迎”,认为“这一未被识别出来的状态是一种思考与言说的方式,它通过抹除自我以及他人的性别特性的标志,使得一种普遍化表述的政治成为可能”^{[23]278}。这为我们解读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切入的角度。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一战”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24]的演说,他高喊“劳工神圣”,还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李大钊也同时发出呼吁:“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上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25]由此,“劳工神圣”的口号风行于当时,之后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工人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觉醒了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也刷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阶段工人阶级觉悟的认识。因此,在新文学草创期,知识分子

作家们就试图到生活中寻找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劳工,可以说,这样的时代背景为鲁迅创作《一件小事》提供了现实依据。

《一件小事》^[26]小说最初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这个时间正是“劳工神圣”的热潮最为风行的期间。在五四文学同类题材中,这篇小说表现出的思想深度在于发现并赞美了劳动阶级心灵的崇高,并开启了知识分子自我反思之路。小说先用两段文字,说明讲述这“一件小事”的缘起,即“六年”来“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给我带来的影响,“便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强调这件事比起那些“不留什么痕迹的”被“我”忘掉的“所谓国家大事”对“我”的意义在于——“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而“看不起的人”从鲁迅启蒙思想发展脉络来看,所指是处于“黑屋子”里的底层民众。然后开门见山交代此事件发生的时间——“民国六年的冬天”,强调这天“大北风刮得正猛”,但天气虽然很恶劣,“我”却因谋生之需“不得不”出门行走,说明“我”的经济状况在当时并不是很乐观。根据上下语意,可能“我”一天不去“S门”就会影响到“生计”,这和那个时代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大致符合。而这人力车因为是“好容易”(其实是很不容易)才找到的,颇能说明恶劣天气里还出门接活的必定也是生活所迫不得不出门卖苦力的劳苦阶级。小说用笔极为俭省,开篇简单的几句白描就将“我”与人力车夫的阶级身份交代清楚了。然后迅即切入事件:人力车夫正拉着“我”在刮尽了浮尘的“洁白的大道”上快跑,却因一时闪躲不及,车把把一个突然横穿街道的老妇人带倒了。尽管作为唯一目击者的“我”劝车夫趁早脱身,免得他“惹上是非”“自讨苦吃”,但他对“我”的话“毫不理会”,而是“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当听到老女人说“我摔坏了”时,他也不曾为减轻自己的责任而作任何辩白,“毫不踌躇”地“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一步一步”地向前面的“巡警分驻所”走去。“我”看着人力车夫远去的高大背影,于是照见了自己灵魂的渺小: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26]482}

该作在文化史上颇具个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对普罗大众启蒙姿态的调整和精神世界的自我蜕变,李何林把“我”理解为“一个接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影响但还需要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7]37},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让人诧异的是,对于《一件小事》的共时和历时性研究都集中在“我”和人力车夫身上,似乎没有人关注到这个事件中出现的第三个人——老妇人,她在小说中承担的角色价值同样是值得深味的。而“我”在小说中对老妇的称谓是“老女人”,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这称谓并非完全不带感情色彩,话语间明显带有一种厌憎的性别态度。“女人”尚且“老”,本身性别价值降低,何况在鲁迅的作品中,凡是老年妇女都是他批判的对象,如《祝福》里寻祥林嫂讲她悲惨故事的老女人,《离婚》中开篇坐船舱里哼佛号,看爱姑,“互视,努嘴,点头”的两位老女人。在鲁迅笔下,有“老女人”称谓的多是一般“无主名杀人团”的老年妇女,她们往往充当着鲁迅最憎恶的“看客”人群中的一员,都是习惯喊喊喳喳背后非议人的令人“憎恶”的性别化的群体符号。而《一件小事》中的老女人尤其让“我”先入为主的反感。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26]481}

其一,按照“我”的文字的描述,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的情况下,“老女人”能被人力车撞倒,恰恰是因为老女人“突然横穿马路”,这行为实有“碰瓷”之嫌;其二,老女人“衣服却很破烂”,说明了她不堪的经济状况,是“我”对无产者往往存在道德瑕疵的刻板印象。况事件发生时天气很冷,“但伊的破棉背

心”偏偏“没有上扣”,导致被微风吹开的衣襟“兜着车把”,然后倒地;其三,明明看她“慢慢倒地”,但当车夫问起时,老女人却回答“我摔坏了”。“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从“我”对事件的叙述来看,“我”认为老女人是故意“碰瓷”,倒下后又“装腔作势”有意讹诈。小说对“老女人”的描写折射出鲁迅改造国民性权力话语中“厌女症”的性别态度^[28],也是出于一种中产阶级“惯习”对底层阶级道德的“有罪推定”。鲁迅在与梁实秋就文学的阶级性展开论战时曾强调文学家会“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29]。这么看来,这样的“性别化的阶级想象”也正是“我”后面进行自我反省的阶级动因。

如果说《一件小事》是自视清高的智识阶级对于底层无产阶级女性的“刻板印象”,而这一“惯习”又由车夫崇高的行为所纠正,由此引发知识分子自我反思,那么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就可以说是“劳工神圣”思潮下对无产阶级女性崇高品质的倾心赞美与顶礼膜拜了。

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30]写于1923年7月,同样是在“劳工神圣”的时代背景下,作家对无产阶级想象性别化的一个生动案例。小说中的陈二妹是烟厂生产线上的包烟工,刚刚十七岁,父亲才刚刚死去一年,是一个无兄弟姐妹无近亲的孤苦的女工。小说采取先抑后扬的写法,先制造了“我”与陈二妹之间因为“我”的作息方式产生的心理冲突,其后在我真诚的剖白下让对方的误会解除。

小说里的“我”本是一位衣食无着、以卖文谋生的穷苦知识分子,几经迁移住进了贫民窟一个矮小逼仄的阁楼里,穷困潦倒的“我”仅靠翻译德文小说偶尔挣得几元稿费维持生计。生活的极度贫困、精神上的颓丧使“我”白天羞于出门,于是过着黑白颠倒、与世隔绝的非正常人的生活,也造成了陈二妹对我身份的疑惑。饶有意味的是小说对作为产业工人陈二妹的刻画与情感态度。陈二妹是烟厂女工,作为“五四”主流话语中资本家工厂里受压迫的“阶级姐妹”,她自己身陷贫困,却能对比自己生存境遇更差的“我”投以真诚的关怀;当她发现“我”彻夜不归、形迹可疑时,便真切地为“我”担忧起来,忍不住问我为何要昼伏夜出,担心“我”走上邪路,劝“我”改过,但当我剖白了自己,她发现原来是自己误会了“我”时,又马上真诚地道歉。在两人结识的过程中,“我”从陈二妹这里显然看到了时代投射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善良、质朴及关心、同情他人的品质,并不由得被她身上所具有的博大的美德深深打动、感化。

我看了她这种单纯的态度,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我想把两只手伸出去拥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说: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30]108}

在“劳工神圣”的五四新文化思潮感染下,在对自己生活处境有清醒意识的前提下,“我”表现出的理性是对陈二妹女性人格的充分尊重和爱护,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我”向劳工阶级的诚心膜拜和敬服。那个境况下的“我”是一个不知前途几何的知识青年,虽然“在外国的学堂里曾经念过几年书”,但与之伴随的是长期的失业与贫病交加,所以连爱人的资格也没有。而陈二妹这个产业工人在“我”眼中显然是“性别化”的,作为无产阶级里的代表性一员,陈二妹身无长物,孑然一身,栖居在与“我”合租的昏暗低矮的阁楼里,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强迫她做”。孑然一身的她又总被工厂里的管理人欺侮,可见她不仅处身于被压迫的阶级处境中,还要同时承受被欺侮被污辱的性别境遇,这也因此让她十分憎恨资本家,憎恶自己工作的烟厂。但她的阶级反抗却是幼稚的,仅限于劝“我”不要买自己烟厂产的烟抽,但唯其如此,她身上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才更为真实可信,完全切合五卅之前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自发而非自为反抗的行动特点。小说中的陈二妹,代表了郁达夫在生活陷入困境时对无产阶级的理想和诗意想象。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认为该小说人物塑造“是高度理想化的圣洁”,认为“主人公已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接触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并用自己无比的艺术和感情描画出了这个阶级的代表的画像”,并强调指出:“姑娘的画像具有象征的意义。它说明: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纯洁与真诚中,在它的尊严与劳动中,才能找到从当前的贫穷阴暗中摆脱出来的解救之途。”^{[31]663}

按照郁达夫的自陈,他的所有小说都是作者的“自叙传”。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能见到贫病交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消沉与颓废的形象,都是以郁达夫本人为原型的另一个愤世的自我。面对1920年代初中国的黑暗现实,小说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愤懑。但从《春风沉醉的晚上》到《薄祭》,作家在思想上相比前期《沉沦》阶段的创作已经有了明显转向。郁达夫已不再执着于通过欲望化书写表现“自我”“性的苦闷”,从而展示知识分子的“灵魂搏斗”^[32],而是转向表现知识分子生活困境与“生的苦闷”。题材上也由原先单一的知识分子心灵表现拓展到主动拥抱普罗大众乃至整个社会生活,艺术风格上则由原先感伤式的自我剖白转向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重要的是,小说力求通过书写劳苦大众的生存境遇抒发知识分子素朴的阶级意识,并有意识地表现被压迫被损害者自发的抗争。

郁达夫将《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祭》《微雪的早晨》归为《达夫自选集》中借以传达无产阶级文学主张的一类,指出这些作品“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但因创作的年代很旧,故而意识不明,力量微薄,标语口号,不曾提出”^{[33]500}。作家虽是自谦,却也说明几篇作品恰恰避免了后起的无产阶级文学标语口号概念化的弊端,写得更为贴近社会现实,如他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这一政论性的书信中说,这些创作源于对“我国的无产阶级的觉醒奋起”的发现,和对“知识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受一样压迫痛苦”的了解,他向作家呼吁:“我们的不平与攻击,就是无产阶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不平与攻击,我们的喜怒,就是无产阶级者在心的深处所感到的喜怒。”^{[33]50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对无产阶级身份与境遇的想象并没有嫁接在苦大仇深的男性产业工人身上,而是借助对一位女工的正面表现表达了作家的无产阶级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的性别化理解,这是小说深意味之处。

处于新文学开端期的五四文学高张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大旗,在积极表达性别平等吁求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吸纳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使性别话语和阶级话语同时进入新文学实践。性别和阶级两种主流话语在开端期五四文学话语实践中并行不悖,相互联结并交互,共同铸就了五四“人的文学”的实质内容,是对现代道德伦理与个体原则的弘扬与捍卫,有机传达了知识分子的先进政治理念,因而是文学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的表征。

[参 考 文 献]

- [1] 何震(署“震述”).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J].天义,1907(13,14):9-22.
- [2] 田汉.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J].少年中国,1919(4):28-29.
- [3] 陈望道.我想(二)[J].新妇女,1920(4):2-3.
- [4] 雁冰.怎样方能使妇女运动有实力[J].妇女杂志(上海),1920(6):5-8.
- [5] 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J].新潮,1919(3):114-117.
- [6] 叶绍钧.女子人格问题[J].新潮,1919(2):107-114.
- [7] 楚伦.一顿饭[J].劳动与妇女,1921(1):6-7.
- [8] 赵小华.女性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种新解读[J].妇女研究论丛,2004(4):10-15.
- [9]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10] 冰心.庄鸿的姊姊[N].晨报,1920-01-06(7).
- [11] 冰心.妇女问题之根本解决[N].时事新报(上海),1922-07-10(2).
- [12] 冰心女士.最后的安息[N].时事新报(上海),1920-03-19(12).
- [13] 牧野格子.谢冰心的“问题”与“主义”[M]//王炳根.冰心论集 2012.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 [14] 王绯.空白之迹 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5] 贺玉波.Ⅱ庐隐女士及其作品[J].现代文学评论,1931(3):18-37.
- [16] 庐隐.一封信[J].小说月报,1921(6):44-49.
- [17] 庐隐.灵魂可以卖吗?[J].小说月报,1921(11):17-23.
- [18] 马克思.异化和社会阶级[M]//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第2版.王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19] 五卅运动编写组. 五卅运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20] 牛雅琪. 中国近代工人形象的塑造[D]. 太原: 太原理工大学, 2022.
- [21] 庐隐. 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J]. 民铎杂志, 1924(1): 1-10.
- [22] 庐隐. 今后妇女的出路[J]. 女声(上海 1932), 1933(12): 2-3.
- [23] 刘禾. 跨语际实践[M]. 宋伟杰,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24] 蔡元培. 劳工神圣[J]. 新青年, 1918(5): 438-439.
- [25] 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J]. 新青年, 1918(5): 436-438.
- [26] 鲁迅. 一件小事[M]//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27] 李何林. 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中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M].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 [28] 程亚丽. 鲁迅的“厌女症”与国民性话语权力关系论析[J]. 鲁迅研究月刊, 2019(6): 4-16.
- [29] 鲁迅.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J]. 萌芽月刊, 1930(3): 71-95.
- [30] 郁达夫. 春风沉醉的晚上[J]. 创造季刊, 1924(2): 99-112.
- [31] 普实克. 论郁达夫[G]//陈子善, 王自立. 郁达夫研究资料: 下.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5.
- [32] 程亚丽. 郁达夫小说女性身体叙述的思想性论析[J]. 文学评论, 2014(2): 39-46.
- [33] 郁达夫. 达夫自选集序[M]//郁达夫文论集.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On the Meeting and Interaction of Gender and Class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Literature

Cheng Yal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gender discourse and class discourse emerged almost simultaneously. However, before the class contradiction becam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the 1920s, the class discourse expressing class opposition and the gender discourse representing women's liberation coexisted in literary practice without contradicting each other. With the rapid spread of Marxism in the early 1920s, the concept of class inevitably entered the consciousness of writers and became an unconscious category and tool for them to analyze social classes. Gender issues, especially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lower-class women, due to their relevance to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their shocking nature, became one of the preferred narrative contents or social expression methods for “for life” writers. The new literature in its initial stage simultaneously organized these two discourses into literary creation. They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jointly achieved rich literary manifestations in the new literary practice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In the works of writers such as Bing Xin, Lu Yin, Ye Shengtao, Lu Xun, and Yu Dafu, the two discourses interacted and overlapped organically, jointly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rum of “hum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interpreting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s of women's liber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The encounter and interaction of the two mainstream discourses of gender and class in new literature foreshadowed the trend of transformation of May Fourth literature in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t not only promoted and defended modern moral ethics and individual principles, but also organically conveyed the advanced political ideas of intellectuals, and was a signific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modernity.

Keywords: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gender; class;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陈忻]